

奇异印度的生成 ——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印度题材书写 为中心的考察

王春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印度的描述突出了印度历史、宗教、习俗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与中国的巨大差异，印度被表现为“奇异”的国度。大量的报刊文章不断重塑“奇异的印度”的形象，并使之根深蒂固，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对印度的集体想象。对奇异印度的描述包括奇异的自然风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及奇幻的艺术与民间技艺等。这些文字共同营造了一个神奇、古怪、难以理解的印度形象，“奇异的印度”成为中国人认识印度的一个套话。这一套话的形成有以下原因：1.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作者们把印度与中国甚至于印度与文明世界置于对立的两极，对印度奇异的描述就是在确证这一对立关系的成立，印度被置于“奇异、非理性、落后、野蛮”的一端。2.混淆了自然现象与文化特征。在描述印度形象时，自然风物方面的奇异姿态经常被解释为文化上的奇异。3.中印之间的陌生导致中国以西方为中介描述和认识印度。经西方转述的“印度”形象，也使印度成为一个特殊的他者，并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奇异的印度”的内涵与19世纪以来西方的印度形象如出一辙，表现出西方知识对中国人的影响。在中国的印度形象建构中，如何避免东方主义的影响，重视印度这个中国的“同一性他者”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印度题材；奇异的印度；印度形象；东方主义；同一性他者

收稿日期：2020-07-10

作者简介：王春景（197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英语文学与中印文化关系。

在20世纪中国人的集体认识中，“神秘”是印度形象的重要特征之一。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神秘”“谜”“不可思议”这一类语词为题描述印度

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如袁南生的《感受印度之谜》《印度处处都是谜》、西川的《印度秘密》、谭娟的《神秘而迷人的国度——印度》、柳静安的《无法拒绝的神秘与诱惑——山西摄影家印度纪行》、方毓强等人的《印度：不可思议的国家》、白央的《印度梦幻之旅》等。在行文中用神秘来描述印度的更加常见。王蒙先生在其《印度纪行》中表达了自己对印度的不解：“印度对于我来说，或者不只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世界，别样的感受，意义非同寻常。……对于这个内容丰富，别具特色与一套特殊的符号系统的宗教（指印度教），我至今仍是一头雾水。”^①当代著名印度学学者薛克翘在其《象步凌空——我看印度》一书中，专门列有《神秘印度》一章。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对印度的主流认识。学者、作家都认为印度是“神秘”“奇特”的，更遑论一般读者大众。印度的“神秘”“奇异”“怪异”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描述印度的关键词。这一认识并非在当代产生，追根溯源，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关神秘印度的描述就已形成规模，沉淀为中国对印度的集体认识。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对印度形象的主要认识是“佛国印度”，且有丰富的印度游记作品传世，如法显的《佛国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但在现代印度，佛教湮没无闻，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古代的文明与现代的没落纠结为复杂的形象，引起中国人或同情或嘲讽的复杂反应，也有唇亡齿寒的隐忧。有学者提出，日本有把中国变为东亚的“印度”的野心。长期被殖民的印度使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发现了民族自信和微末的优越感，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又使中国人吸取了斗争的力量，在这种矛盾的时代语境下，印度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的他者。这些因素决定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印度书写有三大倾向，一是突出了印度之难以理解的奇异，二是希冀在佛教传统中寻求中印沟通的桥梁，三是在印度寻求独立的斗争中反思国家发展的方向。其中，“奇异的印度”成为描述和认识印度的一大方向。浏览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上所登载的印度题材作品，可以在时间的断面一窥“奇异”印度形成的过程。

一、奇异的印度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印度的描述突出了印度历史、宗教、习俗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与中国的巨大差异，印度成为“奇异”的国度。大量报刊文章不断塑造“奇异的印度”的形象，并使之根深蒂固，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对印度的集体想象。

在“民国报刊”数据库以“神奇”“神秘”“奇异”这些主题词搜索中国对

^① 王蒙：《印度纪行》，《中华散文》，2002 年第 4 期，第 4~7 页。

外国的描写，有关印度的文章数量仅次于美国，这说明在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中，印度和美国是神奇异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国的奇异主要指向高科技等物质文明领域，印度的奇异则表现为宗教、习俗等精神文化领域，这两个被描述为“神奇”的国度似乎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两极。作为一个进入现代世界的文明古国，印度的很多事物都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印度在诸多文章中被描述为一个“奇异”的国度，“奇异”“奇特”“神秘”是描述和想象印度时的一个关键词。印度之奇异的描述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奇异的自然风物，如印度的奇树、奇鱼、蟋蟀、大象；也有奇特的风俗习惯，集中于婚姻习俗和宗教实践，如印度的童婚、寡妇殉葬、苦行等；此外，印度的建筑艺术和民间技艺也吸引了国人的注意力，有些文章描述了印度的奇塔、石窟、魔术、奇药等。

两国不同的民间风俗首先受到中国人的关注，很多文章以猎奇的态度进行了描写。如1906年，《新闻丛报》第4卷第20期《杂俎》栏目发表文章《印度之奇习》：

印度之一部落，所谓柯照卫族者，其中上自首长，下至一般住民，自早起以至夜寝，殆无一息不歌。其冠婚丧祭等礼，固以音乐为必要不可缺，即其酋长，亦常择美声善歌者以为之。而酋长发号令训示于其部下时，亦以歌代言文字。此实世界中独一无二之怪习也。^①

这则奇闻在1907年6月于《通问报》第258期重新刊载，改动不大：

印度之一部落，哇其甫爱夷族，自首长以至平民，早间睡起，须唱一种特别的歌谣，直至夜寝为止。每逢举行冠婚葬祭之时，均以音乐为不可缺少之事。其酋长必选声音最美者充之。当酋长传训至于部下之际，亦用歌曲为之，诚可谓罕见之奇习矣。^②

这两则文字明显有着共同的出处，笔者疑其译自西文报刊，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两则文字对这个奇特的印度民族的名字采用了音译，但“哇其甫爱”与“柯照卫”读音差别很大。暂不去考证是否实有其族，这两则文字都突出了印度之奇怪、罕见、独一无二的习俗，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重要仪式中，人们嗜爱音乐，歌唱不息。

在描述印度奇异风俗的文章中，与女性相关的风俗占有很大比重，集中在童婚制、萨蒂制（殉葬制）。关于印度的童婚习俗，国人多有记载，视之为有悖伦常无法理解之事。1911年，《小说月报》第12期发表《印度人道之悖乱》：

印度人种之不能振兴，以早婚为一大原因。据最近调查之报告，谓印人八岁

① 佚名：《印度之奇习》，《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20期，第117页。

② 佚名：《印度之奇习》，《通问报》，1907年第258期，第7页。

以下交姻者，多至一百五十万名，十四岁以下交姻者，八十万名。去年，某西报载印度某地有一七十岁之老人与九岁女子交姻，人道之悖乱，至此极矣。^①

文章虽短，但以精确的数据描述了印度童婚制的盛行，并以西方报纸刊登的一个极端事例说明印度“人道之悖乱”，对整个印度社会进行了道德谴责。

殉葬制是自18世纪之后，西方人描述印度时经常提到的事件，这在中国的印度书写中也有所反映。1936年，《现代读物》第19期刊出一篇文章《印度人的结婚奇俗》，详细介绍了印度的婚姻习俗，包括童婚、结婚仪式、殉葬：

印度是个神奇的国家，这句话印度人自己亦不否认，世界上通行早婚，要算印度第一。大凡印度人到了十二三岁，似乎已经具有做父母的资格了，他们至三四岁时许约，往往到十一岁光景就许嫁了。

结婚仪式，极为简单，到了好日那天，新郎随着亲人伴送到新娘家中，将衣服首饰奉赠，就与新娘至庭中举行仪式。仪式完了，宴会二日乃至五日之间，新娘新郎相将携手到夫家，然尚未真个算结婚，新娘也滞留新郎家数日，再由家人伴送归宁，才算真的夫妻了。

婆罗门种族中人的妇女贞操观念，在昔极为重视，丈夫死后，举行火葬时，为之妻者，定必与之共烧偕亡，此种制度可谓惨酷极了，现在风气渐开，间有允许再婚，并不强之殉葬的。^②

这段文字试图全面介绍印度的婚礼仪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描述也存在不够客观之处，如其认为“结婚仪式，极为简单”就与事实有很大的差距。

对印度童婚的关注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依然存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印度的早婚及婚期中丈夫艺术》有这样的描写：

印度是佛教的王国，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印度地在热带，所以那儿的人民发育是较早，到了十二三岁，已经是一个成人的模样了，所以，世界上早婚的国家，也就是印度。

在印度，十二三岁的小孩子结婚已经不是奇事了，甚至于有八九岁的时候就结婚的。印度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已经做了孩子的母亲，她是在七岁时结婚的，八岁时生的小孩，说起来，这是奇事，而在印度，一点也不稀奇。^③

除了描述印度文化中与女性相关的奇异风俗，也有一些文章通过描写人们对女性的奇特或扭曲的态度，批判印度国王的专制暴力。1911年《真光报》第3期上有一篇文章《印度王愤杀偶像》：

① 佚名：《印度人道之悖乱》，《小说月报》，1911年第2卷第12期，第186页。

② 佚名：《印度人的结婚奇俗》，《现代读物》，1936年第9卷第19期，第70页。

③ 博美：《印度的早婚及婚期中丈夫艺术》，《小姐画报》，1940年第2卷第4期，第13页。

印度涅巨罗王龙巴哈都，有后患豆疾，愈而痂痕著面，愤其容之毁也，仰药自杀。王大悲恨，乃诅其国，杀其医，毁其所事之百神。其杀医也，鞭背三百，一一联而劓之。其毁神也，先为文檄数其所素享之岁祀，羊几千头，饷几百斤，乳几千格伦，乃今无功。王今行诛，命武士列礮伍，轰祠庙。读文已，下令燃礮。武士或战栗奔走，宁死不敢奉诏也。连杀四五人，而后梭举，盖半日之顷，其都之祠庙，宏壮崇侈无一存者矣。考天下史书，载毁神事，此为最烈云。见斯宾塞群学肄言教辟篇。^①

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印度国王的故事。因为王后病愈后不能接受脸上的疤痕而自杀，国王就愤怒地惩罚了医生，并毁灭了世代敬奉的神庙。这个故事一方面突出了国王对王后的爱，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王的专制暴虐。国王一发怒，可以随意杀人放火，毁灭宗教神庙，其专制放任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最后注明，是译自斯宾塞的文章。

王新之在描写印度之多妻制时，也谴责了国王的无道：

散处印度各地之印度废王，由英政府授年俸而注之于“齐那那”，置本国与他国支配之下，使自身食他国之薄禄，而幽闭多数女子于“齐那那”，像此无心肝之国王，恐世界别无他处。^②

这些文章通过描述对待女性的奇特方式和态度，突出了印度国王的专制暴虐，呈现出印度本土统治者的负面形象。

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在这一时期也呈现为奇异难解的神秘，相关描述多以有悖人道的事件强化印度宗教的非理性特征。在特殊的宗教观念下，有些印度女性被献给神，有些被指定和大树等非人类的物体结合。在描述这些事件时，作者们大多认为这是宗教对女性的迫害，并对印度教僧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嘲讽和批判。

印度人的迷信“神”非常之强，奇想天外有所谓“神的结婚”，如此种把戏，大多是恶僧利用一般人宗教狂的恶戏，美妇人或受丈夫之意，父母之命，有愿献身给神，而为神之妻者，一家一族认为无上光荣。其实所谓神的妻，乃僧之妾也，待神妻年老色衰之时，寺主代神宣言离缘，以热铁烧红烙印弃妇，凡烙印其上的神妻，竟到处受人尊敬云。^③

在以上的描述中，神婚没有任何神圣的意味，只不过是印度教僧人满足私欲的方式。“恶僧”“僧之妾”等词汇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批判态度。

印度教僧人在民国时期的文字中多是负面的形象。1916年，《余兴》杂志在

① 佚名：《印度王愤杀偶像》，《真光报》，1911年第10卷第3期，第34页。

② 王新之：《印度人之结婚与多妻制》，《妇女月刊》，1928年第1卷第5期，第20页。

③ 佚名：《印度人的结婚奇俗》，《现代读物》，1936年第9卷第19期，第70页。

“海外奇闻”栏目刊登文章《印度教规之不严》，其中写道：“印度教之迷信者，每日晨起，必吞白牛之小便，额上涂以白牛之粪。该教之僧侣，淫暴不堪，偶见美丽之少女，不问其为他人之妻或他人之女，若辈辄托名神勒横行占夺，以逞其淫欲。”^①通过描写僧人对女性的暴力占有，作者对印度教的所谓僧人、圣人的神圣形象进行了解构。

1936年《布道杂志》第9卷第3期刊登文章《印度教徒的奇俗》，其中写道：“印度有一批教徒，常年都是赤裸裸的。他们敬神极诚恳，晨昏祈祷。这些教徒，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虽不讲究穿衣服，对于头上的发，颊下的须，却是非常爱惜，时常施以奇异而漂亮的装饰，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装饰。”^②

中国人对印度僧人的苦行，也进行了具有嘲讽意味的描述。在1935年《通俗文化》第7期刊载了一组印度托钵僧的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为“印度托钵僧，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吹着吹着，人们都围拢了来……印度的托钵僧，十年树人，立着立着，一立十载，所谓何来，为着虔诚？为着钱财？”^③1939年第7期的《三六九画报》也刊登了印度僧人千奇百怪的苦行方式，看起来如同自虐，“臀部向前，两足向后，上下肢完全折成两部，作拜佛状……折其一腿向后成三角形，而枕其足，此亦坐禅之一种”。^④这些描写都解构了印度僧人的神圣性，只剩下了奇异、怪异。

当奇异的印度成为一种通行的说法，所有奇怪的事情安在印度身上就不足为奇了，甚至于有些故事完全超出人们的理解能力，表现出荒诞不经的色彩，如下面两则：

印度的奇妇人

据说印度马德里^⑤地有一个妇人，是一个织布工人的妻子，今年二十岁，伊已经有十三年不吃一滴水一碗饭了。所以社会的人士，对于伊都是非常注意。而且伊虽然十三年不吃茶饭，伊的身体，人家看起来却非常健康，并且还养过三个孩子咧。伊的历史，的确可以编一册有趣味的故事。而当地的长官，最近也曾去访问过伊。据说有一次伊从丈夫的家里，回到伊的娘家去，但走到中途，伊突然倒下来昏厥了。后来就送到医院里去，在医院里，伊住了两星期之久，才回

① 钟瑞：《印度教规之不严》，《余兴》，1916年第20期，第107页。

② 山木：《印度教徒的奇俗》，《布道杂志》，1936年第9卷第3期，第37页。

③ 《印度的托钵僧》，《通俗文化》，1935年第1卷第7期，第1页。

④ 《印度僧侣之难业苦业修行》，《三六九画报》，1939年第1卷第7期，第5页。

⑤ 疑为马德拉斯。笔者注。

家去。那时医生用尽了种种方法，使伊开口，使伊说话，使伊吃东西，但完全无效。而且伊的身体，却依然健康。伊究竟为什么晕厥和不开口，医生委实没有办法知道，只好送伊回去。但经过了二年之久，有一天伊突然开口讲话了。现在伊在家里帮助丈夫料理家事，但伊仍不吃东西。^①

印度一奇人

印度有修炼士名喜拉南德者，近向路透社记者发表惊人之谈话，据称彼有一师，年龄在三百岁以上，并无衰老之容，常在印度境内云游，居无一定所，且不知其是否有死亡之日。^②

这种明显超越了科学思维的故事不胜枚举，都在突出印度现象的非理性特征。

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一本介绍印度的画册，书名就定为《神秘的印度》，其中有些内容曾经在报刊登载。全书选编了62幅有关印度的图片，每幅图片下面都有简单的说明文字。图册最后附有同名文章介绍印度的“神秘”：

说起印度，总觉得这一个国家是带上了些神秘性的，不但因为他过去宗教上的素养，近数年来一边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一边有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在各层阶级间获得支持，也觉得它确是有些不可了解性的。^③

从内容上对这62幅图片进行分类的话，占最大比重的是宗教性的图片，有23幅，宗教性的内容涉及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画册介绍了印度最著名的恒河，有关恒河沐浴的场景3幅，恒河边的葬礼2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7幅有关宗教节日里苦行的图片，这些图片展示了虐待肉体的苦行者，充分表现了印度之奇异。第20幅是一个钢针刺穿嘴巴的殉教者；第21幅是一个用铁丝勒紧自己的殉教者；第24幅是一个人赤脚蹲在插满铁钉的木板上，图片下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最令人惊异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忏悔者：以为只有痛苦能镇静他们对神的信心。他无望于地上，他却渴望着天国里的一切！”^④第40幅是用长长的银针穿过两颊的人，作者感慨“不甚见血”；第51幅是一连几天蹲在芒鞋上的人，头上有个猴子，“他以为目前加在他肉体上的痛苦愈深，将来在天国里愈能享乐”^⑤；第57幅是一个在Tree miri 节上，鞭打自己的人，旁边有人群围观。作者认为印度人的苦行是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痛苦换取来生的圆满，认为这种人

① 《印度的奇妇人》，《青年世界》，1932年第1卷第7期，第102页。

② 《印度一奇人》，《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5期，第17页。

③ 赵家璧主编：《神秘的印度》，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页。

④ 同上，第24幅图下。

⑤ 同上，第51幅图下。

生观病态落后，让人难以理解。第50幅是在宗教节日里敲鼓吹笛的少年，作者写道：“铜鼓和印笛的杂奏——强迫了苦难的人，形成一个宗教的狂欢。图里这班孩子，在不久的将来，亦得把自身糟蹋在肉针、大钉和铁钩里呢。”^①这段话表明，作者认为那些自虐的苦行者已成为印度独特的文化现象，代代相传，很难消失。作者也解释了苦行背后的文化逻辑：

他们的根本教条，是藉牺牲献祭去取媚于神；用禁欲的方式去涤荡他的灵魂，而获得超越自然的妙力。所以他们相信人类要获得大解脱，必须牺牲自己去向神明致敬，这一种思想，遗传至今，还在印度各处的街道，看到一种自虐狂的表现。^②

到印度去旅行的人，看到这些勇敢的信徒，有时真不相信他们确是不感到痛苦的，但是看他们面上那种悠然自若的表情，不得不佩服这些神秘的印度人了。^③

可以看出，作者对印度宗教的理解比较肤浅，把苦行看作自虐，强化了其神秘不可解的特征。

这本画册中也有10幅图片涉及到民族独立运动，这些图片反映了当时的印度人民对甘地的敬仰，表现出甘地在印度的巨大影响力。第38幅图，是人们在甘地生日的当天，把甘地的巨幅画像挂满了花环，还要走上街头巡游；第31、34、36幅图，都是关于人们追随甘地参加食盐长征的情景。图片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对读者很有冲击力。第42幅，是响应甘地号召从事纺织的人，“在甘地的领导下，人们都学会了纺绩。他们坚信：自纺自绩，也许能挽回印棉的颓运”。^④但是作者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及其巨大的影响力感到无法理解：

甘地的思想，是根基于印度教的，他相信坚守真理，所以主张归真返璞的圣河，对于东方人静穆冥思的圣河，最所赞赏，而对于近世西方的物质文明，视作毒蛇猛兽。……在物质文明已战胜一切的今日，还苦劝人民回到古代简单社会去，这真使我们要觉得，不但甘地的思想有些神秘，整个的印度，也神秘得确有许多地方不是我们所懂得的了。^⑤

画册中有10幅是介绍印度奇异的动物及与之相关的狩猎和捕鱼活动，奇异的动物如狮子、大象，以及具有冒险性的猎狮场面。可以看出，虽然《神秘的印度》选取了一些现实题材的图片，但并不能改变全书对印度“猎奇”的心态。印

① 赵家璧主编：《神秘的印度》，第50幅图下。

② 同上，第2页。

③ 同上，第3页。

④ 同上，第42幅图下。

⑤ 同上，第13~14页。

度在整本画册中集中呈现为“奇异之国”，印度人及印度宗教显现为光怪陆离的面貌，令人难以理解。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报刊上，有关印度稀奇古怪的文章非常多，在很长时间内，印度故事都占据了世界奇闻版面。到1946年，依然有文章以《印度奇风：十岁女孩居然怀孕》为名（《世界珍闻》，1946年创刊号第2页）。还有文章借20世纪40年代中国远征军的真实历史描述军人神奇的印度经历：“近有从军友人来访，谈彼在印度受训时之情况，得聆佛国风光不少。彼更相告奇闻一则，为闻所未闻之事，谨以笔录，聊资谈助。”^①讲述的故事确实属于奇闻怪谈，说几个到印度去的中国军人在闲暇时间到丛林中打牌避暑，离开时把纸牌遗漏林中，一军人独自返回寻找，结果一去未归。战友们以为其为猛兽所伤，已离人世，遂为之办了丧事。结果一年之后，此人从山中回来，告知大家他被一母猿所掳，困于山洞之中，一年后才趁机逃出。作者结尾时写道：“此类奇闻，虽未有亲睹者证实，然亦不至悬空虚构，故姑志之。”^②很明显，作者还是宁信其有的。

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以“奇”为名描写印度的文章不胜枚举，如“海外奇闻”“印度奇俗”“印度之奇习”“印度奇树”“印度奇石”“印度奇塔”“印度僧侣之奇术”等。这些文章共同营造了一个神奇的、古怪的、难以理解的印度。“奇异”成为描写印度的关键词，构建了20世纪上半叶“奇异的印度”之神话。

二、“奇异”套话的生成机制

当“奇异”“神秘”成为中国人描述印度的关键词，“印度是奇异的”这一套话也就形成了。套话是人们对异文化已经固化的认识，如法国人的浪漫、英国人的绅士、德国人的严谨等，都属于关于这些国家的套话。套话是一种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的刻板认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固化的描述。

关于套话的形成原因，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曾经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1.表语与主要部分的混淆；2.本质与两分法；3.自然属性和文化间的混淆^③。也就是在跨文化认识中，以部分代替整体、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以及自然和文化的混淆是套话形成的原因。“奇异的印度”这一套话的形成也有体现。

在描述印度形象时，自然风物方面的奇异姿态经常被解释为文化上的奇异，

① 石四：《人猿通情，我受训军人被猿所掳，山果供食情意绵绵焉》，《周播》，1946年第13期，第6页。

② 同上。

③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增强了这一套话的力量。如《印度奇树》一文：

印度海特拉巴特某村附近有一棕树，每于正午或日落时，辄弯折于地，如鞠躬状，观者趋之若鹜。一般人咸信此树系依照印度教徒习俗，每于祈祷时即匍伏于神灵之前。世有含羞草，今复有祈祷树，亦可谓无独有偶矣。^①

此文把树的姿态和印度教徒拜神的姿态进行了有效的混淆，从而阐释了印度之奇。

印度的自然条件也被用来解释印度的奇异风俗。如有人认为印度的气候奇热，导致印度人普遍早熟，因此有了早婚的风俗。梁抚的文章写道：“不过我们知道，印度女子是早熟的，如先举行婚礼而未到某一年龄时不准同居，这是很困难的。”^②这一解释与西方 18 世纪的观察者所记载的非常相似，《亚洲的去魔化》一书对此进行了论述，西方民族志、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气候等自然条件造成了东方人的怠惰、懒散。

在这一套话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混淆自然特性与文化传统，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对“他者”的描述中，总会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个比较的意识，以自我对比他者，自我与他者处于对立的两极。而对两国文化的差异描写往往不是客观的，描写者或观察者往往会在比较的框架内对异文化进行评价。因此，这些有关奇异印度的描述并非客观写实的记录，而是体现出当时中国人认识和理解印度的方式及途径。突出印度的奇异，是在与中国对比之中得出的结论，强调甚至夸大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作者们把印度与中国甚至于印度与文明世界置于对立的两极，对印度奇异的描述就是在确证这一对立关系的成立，印度被置于“奇异、非理性、落后、野蛮”的一端。

前文中所举印度奇习的文章，其之所以把热爱歌唱作为奇习，言下之意就是这与中国基于文字的交流方式完全不同，有书写文化的民族似乎具有了更文明的特征。通过描述印度的童婚制、殉葬制及寡妇的悲惨生活，作者们从中表达了印度的落后、停滞。如 1935 年《申报月刊》第 4 卷第 1 期有一篇介绍印度婚俗的文章，题目就是《尚墨守数千年神秘风习之印度人结婚式》，突出其墨守成规，千年不变。作者对印度童婚有悖人伦的评价，就是在凸显中国婚制的道德文明。

“奇异的印度”这一套话的形成，与 20 世纪初中国对印度的陌生也有直接关系。20 世纪初，中国与印度往来不多，在西学东渐成为主要文化趋势的背景下，印度是被中国忽略的一个落后国家。陌生就很容易产生奇异之感。中国人所描述

^① 《印度奇树》，《圣公会报》，1936 年第 29 卷第 19 期，第 29 页；此文还刊登于《时兆月报》，1937 年第 32 卷，第 3 期，第 32 页。

^② 梁抚：《印度的童婚制》，《东方杂志》，1930 年第 27 卷第 11 期，第 96 页。

的奇异的印度，突出了其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个被英国殖民的国家，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种族阶级各个方面都与中国不同，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国人认为其是一个奇异的国家。

书写奇异的印度，反映了当时国人的猎奇心理。印度成为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存在，中国人只是把它当作文明世界的异类进行描写，这时的“印度他者”丝毫不具有能动性，不能进入观察者的世界产生影响。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出的“奇异的印度”，一方面反映出彼时中国人对印度的肤浅认识，同时也体现出中国人对待印度时封闭的心态，只是在猎奇式地窥视印度，评说印度，并未达到文化交流、互相启示的地步。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莫哈区分了异国形象的“奇异性”与“相异性”，他认为“奇异性”的描述具有如下表现：

他者在这些描述中如同反面或复制物，被一面几乎不走形的镜子反射了回来。它指的是一种映像，一个调节好的反射行为，完全取决于表现外国人的主体（和文化）。用几笔粗线条将一个民族和任何别的团体的形象固定下来的套话，就是这种将他者形象压缩到一个相对狭窄的层面里的极端情形。^①

也就是说，描述一个异国异族的奇异，是在文化交流中取消了主体的回应，只是进行“反射”，把异族文化作为一个与本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异类呈现出来。其中主体的态度是冷眼旁观甚至嘲弄讽刺，这基本符合中国有关印度的奇异的描述。印度是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非理性的，与中国人观念中的理想国度风马牛不相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奇异的印度”是意识形态式的印度形象。

长期以来，中印之间的现实接触没有得到有效、深入的开展，语言及文化障碍依然存在，因此，“奇异的印度”就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不断沉淀，不断固化，这一套话在很长时间内存在着，影响着中国人对印度的认识。其中包含的是漫画式的、简单化的形象内涵，体现的多是负面的印度形象。巴柔曾经这样分析一个国家所塑造的异国的负面形象：“在由国际文学交流开辟的研究视域内，负面形象，仇视他者的关系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所谈论的交流是单向的：他是某个人，某个集团的行为，他们面向异国而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②可见，“奇异的印度”这一负面的套话无益于作者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提高对自我的认识。同时，异国形象的塑造也体现出特定社会的等级关系，“一个神话思想提高了一

① 让-马克·莫哈著，段映红译：《文学形象学与神话批评：两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交汇与分析》，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25页。

②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41页。

些地域的身价，孤立了某些地域，又使另一些受贬”。^①作为他者的印度在“奇异”的神话中成为被贬低、被嘲弄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者也强化了对自身文明的确认。

三、东方主义的影响及警示

“奇异的印度”这一套话中包含的印度的落后、停滞、野蛮、专制、非理性，这些中国人对印度社会的看法，与西方学者的看法如出一辙，引人深思。

20世纪初的中国人对印度感兴趣，与当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有直接关联。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构成了世界的特殊组成部分，英国人的印度题材作品以及印度游记开始被中国人了解；同时，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逐步深入，印度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备受关注；圣雄甘地的事迹在中国报章不断出现，泰戈尔来华也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因素一起促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印度的兴趣。

印度的重要性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1920年第7卷第12期的《教育公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印度的重要地位：

窃查世界文明，其发达最早而又特为宏伟者，首惟印度，即为欧西文化同源之希腊，其数理哲学之发明，亦多资其沾溉。如斯特拉波^②地志诸书所记可考也。惟欧西文明，自希腊罗马而降，自循一途而发达，以臻于极盛，其效绩之彰，诚有足惊者，然以最近科学研究之所得，与夫大战后社会人事之变迁，欧西学者又复沈观远虑，以为欧西文明至今已当变通之运，因欲返求东方文明之真精神，以融合乎最近科学哲学研究之结果，而创为新世纪之文化，以期世界终进于至善。故近日印度文明之研究，在欧美学府中已甚为注重，而或由国家资遣，或有私人志愿之亲往印度，探讨其古先文明之真者，尤日增月益，为数至众。吾国地居东亚，其自有文明之发达，又多与印度相关涉，而印度文明之探讨，其事业乃独任之。欧人新世纪文化之创成，或竟不助一手一足之烈，诚恐将遗论者之讥。此关于世界文明，有志愿赴印研究者在也。至专门学艺，其可在印研求者，如梵文为世界多种文字之远祖，今日比较文字学之成立，实基于梵文学之研究。欧美学府之中，已视为甚重要之科目，而吾国志学之人，尚鲜加意。^③

在描述印度之重要地位时，该文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价值标准，因印度文明的世界意义已得到西方人的重视，因此，中国人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印度。这种经西

^①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68页。

^② 斯特拉波（Strabo，前64~前23），古罗马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历史学》43卷，《地理学》17卷。

^③ 《指令第一千八百七十五号》，《教育公报》，1920年第7卷第12期，第52页。

方转述的“印度”形象，也使印度成为一个特殊的他者，并影响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

这一时期中国人有关“奇异的印度”的认识与印度知识的西方来源有关。如前文提到的文章中，译自斯宾塞或译自路透社的文章都做了清楚的说明。其他文章中进行说明的也不少，如1918年发表在《大同报》上的《观印度之赛神记略》就指出：“中印度有一神山，赛会时香客游人甚众，有西人某君往游其地，记其情景。”^①因为信息来源于西方，中国人对印度的描述和认识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影响。

西方在18、19世纪对东方的书写已经形成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东方，特别是近东，是欧洲人最爱游历和书写的地方”。^②西方对印度的描述在19世纪有两个倾向，一种是把印度神圣化，认为那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对抗西方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净土；另一种则来自19世纪更加普遍存在的殖民主义思维，认为印度是野蛮的，落后的，充满了奇风异俗的，具有爱德华·萨义德所说“东方所显示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性”^③，以此凸显英国统治、教化印度的正义性。印度之奇异早已是西方人的印度话语之一。追逐东方的奇风异俗是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描述东方的主要倾向，其中突出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一观念就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观念，其中东方成为西方的有益的参照，“作为二律背反的西方，东方就是西方的反面：那里没有理性，却有激情、神奇和残酷，没有进步和现代化，不是身边的日常生活，而是迷人的远方，是逝去的花园或重新发现的天堂……”^④其中的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也非常明显：“多种多样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他者生理、精神低下或不正常性的错误证明之上的。”^⑤对此，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⑥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⑦对印度婚姻习俗的描绘突出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否重视女性成为判断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标准，“文明人重视女性，重视女性便是文明

① 《观印度之赛神记略》，《大同报》，1908年第9卷第21期，第23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3页。

③ 同上第135页。

④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81页。

⑤ 同上第161页。

⑥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1页。

⑦ 同上第49页。

人”^①。印度的奇异、怪异就成了被建构出来的形象。“自从欧洲不再公然焚烧异端和女巫后，焚烧寡妇的行径便彻底成了印度令人悚然的特征。”^②而怪异的想法，大多是因为无法或者拒绝进入印度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无法进入异国的感官世界，便容易把可以用理性好好解释的东西，视为怪异或有异国风味”。^③

20 世纪上半叶中印之间现实交流的有限及语言的障碍，决定了在认识印度时西方语言 and 知识承担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自然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印度认知。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多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泰戈尔访华的波澜即是明证。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印度题材的书写中，出现肯定英国殖民统治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梁抚的《印度的童婚制》介绍了童婚制在印度的盛行及童婚制对女性的危害，介绍了英国统治印度后所进行的废除童婚制的改革，肯定了英国政府对印度社会改革的贡献；王新之在《印度人之结婚与多妻制》中认为废除多妻制是英国政府对印度的伟大贡献。

可以看出，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在文化立场上更倾向于西方世界，而现实中半殖民地的境遇又使这种倾向表现出某种尴尬。中国与印度在西方知识的视野中，都是处于东方的概念之下，并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中国人认识不到印度作为同一性他者的意义，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对印度的认识，就如同完全接受西方东方主义的中国观念，在思维的起点上认同了殖民主义。这不能不让我们警醒。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对“他者”的理解和借鉴是认识自我的重要途径，“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④。

印度作为与中国具有类似历史境遇的国家，值得中国人进行严肃深入的认识和分析。直到目前，两国之间的理解还很不足。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印度人和中国人彼此一成不变的成见阻碍了他们看到其历史及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中的相似之处。”^⑤因此，我们需要打破成见，打破封闭的不加科学探索的人云亦云式的知识建构方式，以期对这个陌生的近邻有更为丰富深入的认识，使印度真正成为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之镜”。

[责任编辑：李丽]

①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 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11 页。

② 同上第 507 页。

③ 同上第 136 页。

④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 426 页。

⑤ 范笔德著，金泽译：《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与世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 页。